

河北省档案资政惠民丛书

◎主编/冯世斌

1952~1968

保定—天津—保定—石家庄



河北省省会 变迁始末

◎河北省国家档案馆/编

HEBEISHENG
SHENGHUI
BIANQIAN SHIMO

河北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作为第一部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河北省省会变迁史的书稿，依据翔实的档案资料，辅以部分事件亲历者的珍贵回忆，全面披露了1952年至1968年河北省省会在保定、天津、石家庄3个城市之间数度变迁的始末，真实、深刻地反映了1952年至1968年间有关河北省省会变迁的全貌。其中既有关于省会选择的曲折而艰难的决策过程，也有省会数度迁徙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难以磨灭的影响。内容详实，文笔生动，引人入胜。对于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省省会的选择，提高领导科学决策水平，建设现代化大都市，推进一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极具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本书史料性强，史料价值较高，兼具可读性，是难得的历史读物。

1952~1968

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

河北省国家档案馆 编

主编 冯世斌

副主编 李会生 尚宏雁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52~1968 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 / 冯世斌主编.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202-06166-4

I. ①1… II. ①冯… III. ①省会—变迁—研究—河北省—1952~1968
IV. ①K2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0128 号

书 名 1952~1968 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

编 者 河北省国家档案馆

主 编 冯世斌

责任编辑 周建图 赵黎黎

美术编辑 李 欣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21 000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书 号 ISBN 978-7-202-06166-4/K·1030

定 价 6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河北省档案资政惠民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冯世斌			
编委会副主任	李 量	耿树伟	张连婷	刘学圃
编委会委员	王 潮	冯世斌	齐东勇	李 亚
	李会生	李 量	刘学圃	吕新民
	杜建强	宋洪亮	张连婷	张彦河
	张根凯	张新朋	尚宏雁	赵亚光
	郝慧明	高丽军	耿树伟	尉迟荔
	康建红	敦树森		



序

谈谈河北在省会选择上的“是是非非”

——写在《1952~1968 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付梓之际

冯世斌

每个省都有省会。“省会”是什么？辞书并无解释，将其称为“省政权机关所在地”，大概比较合适。万物皆变，变皆有因。省会变迁并非河北省的“专利”，然像河北这样，在建国初年提出迁省会，继而忽建忽徙，大费周折，三易其地，明是损伤累累，却还意犹未尽，直至被周恩来总理所制止，是举国罕见的。个中原因是何、对今有何鉴益？现在一些文件、讲话和省情介绍，不仅河北，而且省外也有地方，习惯上把河北称为“京畿”。一个“畿”，蕴含了历史和现实的多少令人遐想而又难以说清的事。相信《1952~1968 河北省省会变迁始末》的问世，对于揭开河北省会的变迁之“谜”，提供了一个导读，也提出了一个恐怕难免的争议话题。借付梓，对书的脉络重点和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再梳理，顺谈谈对这段“是是非非”的认识，以期评鉴，亦充为序。

一、研析河北省会迁移的整个过程，总要与保定缠来缠去，欲说“迷途”，堪称“困局”

今公众当然也包括笔者，之所以对河北省会变迁有种“谜”的感觉，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动机，即为什么？二是结局，即又是为什么？坦白地讲，书稿虽成，但要清晰回答还是困难的。首先，从新中国诞生的大背景上看，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央机关离开了西柏坡，道理上，河北省的政权组织，也有个进城问题。而河北对其省会的选择，不能与这之际的“进城”联在一起。因为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

先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8月），并定居在了昔日的“直隶总督府”所在地、当时的华北大城市保定，当年即将就任省主要领导职务的林铁同志，就是在这里见到了毛泽东并送中央机关北去，河北要进城进哪里？因此，溯动因，细搜文件多种，从时间上，当从1952年说起；从内容上，用“喜新厌旧”加以形容也并无不恭之意：找新地方、建新省会、图新发展。这个新，最初就是石家庄市。

综合1952至1954年省向中央的三次报告（冀档855-1-201-1；冀档855-1-201-2；冀档855-2-558-21），“喜新”的理由主要是：石家庄，“在河北全省的城市中，地处京汉、正太、石德诸铁路干线的交点上，工业比较发达，且有发展工业的各种优越条件，将是全国重点工业城市之一，也是军事要地，石家庄市势将成为全省的经济、文化中心。根据中央关于城市建设的方针及河北省工业发展趋势看，河北的重心将在南部，省会迁移到石家庄市对省级党、政、民各部门加强工业建设的领导将提供便利的条件”。至于“厌旧”，“旧”有哪些不好？报告均是简单的一句：“省会在保定不能适应今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2年9月19日）；“保定由于先天不足，在相当长时期内轻、重工业皆难以发展”（1952年10月24日）；“保定市扩大建设工业的条件是欠缺的，虽经几年来的恢复与发展，但在较长的时期内很少可能建成工业城市，实难适应新的领导任务”（1954年1月27日）。省会离保定，保定做何用？当年也有一句话“省会迁移后，保定市可作为我省一个以文化建设为中心的城市”。时过境迁，“实话实说”，这些“喜新”与“厌旧”的理由是牵强的。论交通条件上，一个“交点上”，并不能说明石家庄比保定有多大优势；说工商各业基础，已是省城多年的保定，总不会亚于石家庄市；至于当时展望的河北发展重心将在南部等，上级怎么看，我们无从知。可能是这理由不充分，中央对河北的报告迟迟未批。后（1954年4月27日），中央虽然同意了河北意见，但同意是“有条件”的：“经费由河北省在地方财政项下自行筹措解决。”（冀档989-1-205-1）

这样，河北在1954年和1955年，连续向石家庄投资1900亿元（旧币，下同，折新约140000），开始了建设新省会（1954年800亿，1955

年1100亿)。1954年时，河北省人口为3442.54万人，财政收入66334亿元，职工干部人均年工资491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64.7万元，当年财政收入上解32786亿元后，省可用预算资金为37597亿元，赤字4049亿元，占预算资金的10.8%。背着赤字搞“自筹”，看当时可用的条件，一是1954年6月，省委向华北局请示，“征收一部分农业税附加”，二是省会迁移筹备委员会通知，“所有各企业、事业部门的建筑用费完全由各企业事业部门自行筹措”。没有记载河北的“自筹”如何落实，1955年8月，省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停止省会迁往石家庄的报告》（冀档855-3-833-3），报告说：要全部完成省会迁石工程共需投资4300亿元，其中省级机关91个单位迁石工程需3700亿元。“经我们多次研究，认为省会迁移确非当务之急……现在工程已经停止，并已确定专门组织负责进行善后处理……尽量避免在善后工作中造成新的浪费。”停迁文件还说出了争迁时未提过的房子问题：“保定房荒虽不像过去严重，……保定即基本上不再盖房。”

评看停迁报告的“确非当务之急”，还有，终于说出了“房荒”等语，讲的是实情、实话，似可产生这样印象：知难而退，认识到位，颇有从实际出发的意味。是的，当时，百废待兴，省还很穷，巨额投资换来了一大堆“半拉子”工程，河北应有这个认识。但接下来的事实只能说，河北迁省会的热情非但未减，而是由“建新”转为“找大”，在“见异思迁”的路上迈出了更大的步子。于是，1956年起，又开始向中央请示：“将天津与河北省合并为一个建制，以天津市为河北省省会”；“或者不合并建制”，也要让“河北将省会迁到天津去”。（冀档855-3-981-11）想来，毕竟是“畿”，中央对河北又高看一眼，1958年2月，经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天津市由中央直辖改为由河北省领导，以此为标志，河北的省会算是进了天津市。

天津，与河北源远流长，1928年直隶改称河北省时，民国河北省政府还成立于此。但也就从那时起，天津与河北，从隶属上走向了渐行渐远的彼此。到1958年时，昔日的“下级”，早已变成了“兄弟”。天津市归河北来领导，搅动了华北的大格局。看省向华北局并中央明确提出：

“确定将省会迁到保定市”，时间是1966年1月25日，看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委员会联合文件《市委、市人委关于省会搬迁的通知》，实际搬出时间，应以1966年4月9日为标志。当时的情景是：由于省会已离开保定多年，当年的省机关用房，大多归了保定市机关所用或改做他用，各方面对再度充当省会实难胜任。按“大分散、小集中”搬迁原则，进入保定市的，仅有省委、省人委及其几个部委办和省军区。省委、省人委分别临时挂牌于北市区合作路和青年路，而众多的省直机关，却没有这等幸运，一溜长蛇般地在保定至天津一线上运行后，只好落脚在保定周围各县里。如省卫生厅，驻涿县；省粮食厅，驻望都县；省教育厅，驻定兴县；省林业局，驻易县。有的单位规模大、人员多，又分散到几个县里。这种“畿之省会”的局面，至少持续了两年余。

河北省会来到石家庄市，当与“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连在一起。众所周知，那是极为混乱的“文革”时期，由乱到“治”，各级都要建立“革委会”。河北的“省革委”如何建、建在哪里？根据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1968年1月28日），建议河北省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但目前原河北省直机关均暂住原地不动等精神，仅5天，即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成立。“省革委”占用的是石家庄地区革委会的办公楼，后又在当时的六中校园，即现在的维明街，匆忙盖起了朝东开门的“省革委”，没想到，这门口一用就是40多年，直到2008年，乘“三年大变样”的东风，省委、省政府才打开了朝南而开的大门，现省人民政府的牌子仍挂于东门。

建国后，河北省省会的来历就是如此。然，回顾起来，真像一个大大的“之”字，又如扳倒了一个“苦辣酸甜”的瓶子。怎么说呢？当年河北选省会，其决心，不谓不大，其历程，不谓不曲，其结局，“建新”没搞成，表层上是财力所迫；“找大”分手了，公开说是因为“战备”；突然到了石家庄，岂不纯属时局之原因（停建后再也没议过续建，北京军区的建议也未提当年曾建这码事）。令人费解的是，到1972年，即石家庄为河北省会的第4年，河北却“怀起旧”来，“批陈整风”中，又向中央提出了省会再回保定（冀档919-2-297-2）。说困惑与复杂，主

要在这里：河北究竟怎么了？一次次事与愿违的结局，好像本来就该这样似的。若不是周恩来总理“一锤定音”：“省会不要再搬！”真难说，现在的石家庄市，是不是河北的省会。上达天听，关于毛泽东主席针对河北省会问题所说的那段话，大部写进了本书里，读者自品，当谓其味无穷矣！

二、河北省会在天津，总的来看不是双赢，而是“兄弟争纷”的不断升级，这也是8年后分手的根本原因

河北省会在天津，计有8年多。看其间省市工作的格局里，按时间排，有三大事情可说与国家局势密切相关或影响了国家的局势。一是，发现和培养了包括“徐水经验”在内的不少典型，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二是，在大搞撤并专区和县的同时应对饥饿难言的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三是，承担组织了“桃园经验”、“小站经验”等试点，在全国带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四清”）。其他的若干工作，基本都带有鲜明的“省是省，市是市”的特征，说起来，真谓一个“剪不断，理还乱”。出版于1996年的《天津通志·政权卷》，对这8年的时光，只记载了寥寥几句，显然也是不愿多提及。河北编书说省会，无法回避“兄弟分手”，试从三个方面做些梳理：

1. 从经济上看，既定利益格局引发的争纷，既拖累了省，又拖累了市，使互补共赢始终停留在希冀。河北争天津之所以不遗余力，照文件讲，主要是看中了天津市的工业基础、技术、地理等优势。河北省农村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要求急剧增长。全省地方国营工业基础薄弱，需要一个有技术基础的工业基地，天津市在这方面能满足河北等。当时，天津市辖8区12县，总人口548万余，其所发的文件，重点讲的也是对河北的物质资源、市场有需。天津市的工业有80%的原料，需要农村供应，河北省是我国最重要的产粮区和经济作物地区之一，除生产大量粮食以外，还生产棉花、麻、花生、芝麻、大豆、烟叶等经济作物，地下资源也很丰富……”对冀津的这些表述，今称“优势互补”，或称“城乡互补”都可以。可事实上，这种意图，从一开始就大打了折扣。以粮食调配为例。1959年~1962年间，全国三年特大自然灾

害，吃饭成为绕不过去的天大难题。河北长期靠“南粮北调”过日子，遇灾实行“瓜菜代”，能拿出什么粮食补市？档案里，大量记载了时省长刘子厚同志数次找李先念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请求给天津从外地调粮食的事。其他如煤炭、水泥等的物资调配、生产计划安排、国家资金投向，无一不是争来争去。时作为计划经济年代“二政府”的计委，市可直接对中央，但请示问题、办事情，又不能越过省，省、市两个计委，围绕物资调拨等存在的严重分歧，都一条一条地保存在档案里。冀档940-5-64-59，是天津市计委《关于行政区域变更后，有关我市物资分配基数的补充报告》，补充的都是困难，需要的都是提高分配基数。省计委何言？没有下文。今或有读者问，如没有这种自然灾害，冀津会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不敢妄断，只能说，当年的这“争”，省争的是“满足”，市争的是“供给”，并不具有今天“竞争”求发展之含义，建制合一改变不了“分灶吃饭”，由此引发的利益争纷，是难以协调的。“天津市的待遇如财政、工业投资、大学生分配等，仍应按照直辖市的规定不变”（冀档907-4-33-11），这正是多年来已形成既定利益格局难以打破的铁据。试想，若不如此，河北“供”天津，更将是包不起，天津靠河北，也更是靠不住。“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信矣。

2. 从政治上，冀津为维护各级干部的团结做了极大努力，但“一股绳”的局面始终未能有效建立。河北硬将天津从直辖市的位置上拉下做省会，首先，原本平级的省、市两个领导班子怎样摆？最初的情况是这样的：原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任了合并后的河北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黄火青（天津）、马国瑞（河北）、刘子厚（外调）、解学恭（中央派来）、吴砚农（天津）、阎达开（河北）、张承先（河北）、万晓塘（天津）任书记处书记。在“九大书记”之后，是省委常委23人。省人委的组成是：刘子厚，兼任了河北省省长，阎达开、李耕涛、高树勋（河北）、胡开明、阮泊生、张明河、杨亦周（天津）、马力任副省长。天津市委、市人委不能因冠以河北而取消，万晓塘，兼任了天津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李耕涛、谷云亭、王亢之、张淮三（天津）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在“五大书记”后是常委14人。天津市人委的组成是：天津市市长，由李

耕涛兼任，宋景毅（天津）、周叔弢（天津）、李权超（天津）、郭春原（天津）、张国藩（天津）、娄凝先（天津）任副市长。今将领导机构及长长的名单一一列出，并非仅为满足今有读者想了解当时的领导人们是谁，主要是想做三点揭示：一是，建制或称机构的合一，最棘手的是领导层的进退留转或称搭配，无论怎样组合，其“磨合”之痛是不可避免的，这痛，是冀津的共同之痛；二是，组成如此庞大、臃肿、交叉任职的机构，实是无奈之举，今想来，恐怕连领导成员们如何分工也是个问题；三是，日后工作运行上的种种不协调、不愉快，及至“兄弟分手”，根源性的责任，确应由河北方面来负。尽管，在这一期间，省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密切省市关系、加强团结、做好工作》、《河北省委关于改进对天津市的领导意见（草稿）》等一系列的文件，还将天津、沧县两个专区先合并又一同划归入了天津市，以促进天津规模的扩大与省市队伍的有效合一，市也就如何正确认识天津地位，服从省委的举措，出台文件多种，但看的出，冀津对如何克服“两层皮”，始终并无有效措施，以致省、市领导们，均从不同的角度大伤脑筋，先后数次召开省、市负责干部会议，大讲“密切省市关系，加强团结”。刘子厚同志还不止一次地专门召集省直干部开会，强调“十分注意团结。省里要负主要责任。从省委一直到各部委、厅、局，因为我们是领导方面”。如此情势下，市是什么态度呢？形成于1961年11月15日的《天津市市级各部门领导干部鸣放意见》最后是这样说的：“除以上意见外，还有些同志提出，天津市是全国性的城市，归省领导问题很多，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最好省、市分开。”从1961年市的“还有些同志”提出“分开”，到1966年4月整个省直机关虽迁出，河北省仍领导天津市至1967年1月，再联想当时省长口中的“我们”，想必读者的心情都是沉沉的。

3. 关于天津与河北分手的原因，拨开纷纭，从本质上透视，上已触及。不错，兄弟分手在“文革”前夜，但当说，与“文革”这一背景看不出有啥联系。当时也确有一个“战备”的问题，依笔者度，这也不是根本。道理在于：其一，当年河北向中央《建议中央将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为一个建制，并以天津市为河北省省会》报告已讲得清楚：“将省会

设在天津市，一旦有战事发生，在对首都的保卫上是有很多便利条件的。”作为首都屏障，正如列宁格勒之对莫斯科一样，一旦有紧急情况发生，在动员全省人民防守天津，保卫首都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岂有刚遇“战备”，这个“列宁格勒”的屏障作用就不再提？其二，天津、保定，均是首都的“南大门”，无论怎样“备战”，首都是首都，保定是保定，天津还是天津，地理的格局是不会改变的，河北将省会搬出，帝国主义就不向天津进攻？纵观当时全国，各省市均在备战，为什么独有河北要将省会搬出去？确如周恩来总理 1966 年 3 月在华北局第五次会议上所讲：“有人反映，‘最好不打或晚打，要打也不要再在天津打，’可笑得很。”总理听到的“有人”该是哪些人呢？以致对此批评是如此严厉。其三，不争的事实和趋势是：“强扭的瓜不甜”，冀津合并后，河北无条件、无能力领导、支援好津市，市也拉不动省，既没有合出“力”，也没合出“利”，反倒是分歧、矛盾越积越多，日益加剧，“兄弟失和”到一定程度，分手是必然的。周恩来总理在华北局第五次会议上，在提天津时，也提到了河北，“要动员干部下去，现在河北省委一搬家，就主动了”。据此想来，借“备战”疏散走之，终是河北认清了形势，主动讲政治，顾大局，中央权衡利弊，同意并表扬河北将省会搬了出去。

三、河北把什么留在了天津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说通，为什么是“省会先迁，省、津再分”，而迁得如此匆急，好像原子弹就在头上悬着似的。“三十六计走为上”，怎一个走字了得？保定毫无接纳准备，与津，还有一个继续领导下去的大问题。所以，迁出，如同当年迁入没有欢迎一样，没有欢送，也没有仪式，只有说走就走，只能将若干的机关“落草”在周边各县拱卫着原省会。双方等到 1967 年 1 月 2 日天津复为中央直辖市的文件下达，才正式开始了“分家”。其时，已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善后”如何善？直到颇多事情不了了之为止。今多遇感兴趣的公众问，河北把什么留在了天津？粗粗梳梳，以下几个方面，大致还是可以说清的：

一是，干部方面。省市分开时，在干部去向上，基本原则是，在省直的跟省走，在市直的留市里。由于河北撤出急，加之不久“文革”大

混乱，具体的干部人事去向档案，现冀、津国家档案馆和有关部门均无完整保留。至于省、市主要领导同志，档案是这样记的：1966年9月8日，华北局向中央提议，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同志回省主持全面工作，留阎达开等同志在天津，帮助市委认真接受群众批评；1966年9月18日，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参加“揭发市委”大会后，翌日逝世；1967年1月2日，天津复为中央直辖市，阎达开同志任了天津市委第二书记。

二是，固定资产方面。省会迁津当年，河北省从预算中划出720万元（新币，下同）建房款，列入市总预算的“其他支出”，同年又安排1.66亿基本建设投资用于市，占当年全省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35.76%。1959年财政部追加河北省迁津行政基建投资400万元，也多投向了市。投资580万元于1960年建成的面积为22000平方米的长途电信中心大楼，投资600多万元于1961年建成的面积为30000平方米的河北宾馆，投资720万元建成的省直机关在尖山的金星里、红霞里和气象里的51幢宿舍等诸如此类的固定资产，留在了天津。

三是，教育资源方面。如在那期间，先后扩建和建立的天津师范学院、天津艺术师范学院、河北财经学院、天津医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包括附中）、天津体育学院（包括附中）及河北外国语专科学校，共7所院校，因多种原因不能迁，也不能分，都划归了市；凡建在市的中、小学校，一律划归了市；河北工学院（现河北工业大学），虽然划归了河北，但校址至今在津市。

四是，水利建设方面。河北缺水，天津更甚。为解天津用水之难，当时采取过一系列工程措施。如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石津运河（后改称石津灌渠），最初是为了开通石家庄至天津的河运水道，由于滹沱河水日渐减少，就变成了为市调运岗南水库水源的专用渠。看1963年石津灌渠管理局制定的春灌配水计划，时岗南、黄壁庄两水库可用水量7.45亿立方米，列供津计划为1.5亿立方米，省水利厅批复中强调“到期石津渠即不准引水，一定要保证按计划向天津市输水”。现在，石津灌渠还在，河北省水利厅，仍保留着石津灌渠管理处这个机构，这渠、这

机构，仍在年复一年的见证着当年冀津的那段“鱼水情谊”。原属河北省水利厅、后属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的天津仓库及河北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到现在也未迁出，只是在1983年将两单位职工户口落在了天津市。河北省基本建设局是1984年才迁至石家庄市的。至于省会在天津这多年，给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或留下了什么影响？肯定是有的，这虽不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但在此亦须郑重提及。

四、反思河北在省会问题上的选择，不得不说的几个话题

话题一：“起跑线”上的跑偏，代价巨大，影响深远。一般公认，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的良好势头从1952年起。“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照理，河北不仅对“两个务必”，而且对“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当有率先认识。然看河北，从1952年开始正式提出了迁省会，及至一行动，就可说跑偏了“轨”。身在省会找省会，全面折射了不仅对保定而且对全省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和城市建设不自信；巨资建新石家庄，主要为了解决房荒（前述需3700亿，占总投资4300亿的86%），而并不是着眼如何“变成生产的城市”；硬挤天津，今天看似不可能，当年偏偏干成了，可这“现成饭”是那么昂贵，直吃得由“在城”变成了“围城”，以致本是省会的保定变成了省机关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之地，直落了个“后天亦不足矣”；无奈到了石家庄，却又再提回保定，更是难用“喜新”或“厌旧”来形容的，直接受影响的，还有廊坊市等，下面将提及。今说代价巨大，造成了财力上的极大浪费和精力上的巨大耗费当无任何疑义。巨资“建新”，半途而废，进出天津，元气大伤；离保回保又离保，所耗之资是难用数值计算的，如非再列组数据，编书所统的“建新”投资1900亿，实不止，有账可查的，向华北局借款200亿未在其内。省投入津市的建房（办公用房、干部宿舍）的资金，也不简单上述几笔；还有众多省机关在保定周围各县办公，搞过多少临建等，现已无必要再查据。为迁石，河北先后向华北局与中央报告了三次，为进津又出津，先后向华北局与中央报告了四次。三次搬迁大行动，动辄干部数千人，加上家属、孩子，要解决多少难题？从1954年“建新”失败开始善后石家庄，到退出天津善天津，其间，两次善保定，对

内对外的善后交织在一起，所耗精力是比金钱更有价值的。长期来，河北有两大落后被国人看不懂，一是到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河北有那么多贫困人口、贫困县在册里；二是城市化进程十分缓慢，城市化率低，低得不及有的边疆省份，到现在仍为“全国平均水平”而追。其实今用城乡统筹的观点溯源头，均与当年一选省会就跑偏了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谈影响深远至要害处，笔者认为，还不是上述这各表象，而是长期来河北有痛而讳痛的心态与思维方式。请示了，批准了，是按上级精神办的！是啊，弃离保定多年后，为啥还到那里去？看遍当年文件，无一句解释。何向当年偿是非？难怪历史上的河北，付出了那么多学费，总是难升级。当年这种“讲政治”的风格，实在要不得。现河北正强起，调结构，转方式，加快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升级，局面来之实不易。痛定思痛，温故知新，实现河北华丽转身，今全省上下，是该有一种彻底承认并跳出“先天不足的不是城而是决策机关”的勇气！

话题二：建设工业化河北，必须要真建，而不是靠“找”，要找的，是符合河北实际的路。河北省是农业大省。在农业大省的基础上建设工业化，河北认识不谓不早，眼光不谓不明。但以抓农业、搞运动的方式去指导工业化建设，河北永远找不到“北”。1952年，河北向华北局首次提出《省会移到石家庄市的请示》，开宗明义讲：“中央关于城市发展的方针及今后我省工业发展的趋势”（冀档 855-1-201-1）；同年《关于将省会迁移到石市的补充理由》，开宗明义第一句：“自从我们检讨了省委过去对工业生产领导薄弱决心加强工业领导以来，日益感到省会有自保定迁移至石家庄市的必要”（冀档 855-1-201-2）；1954年1月27日，省第三次向中央报告《关于省会迁石家庄市的请示》，头一句话，仍然是：“适应国家工业化及有计划地建设的需要，省的领导重心必须转到有工业的城市”（冀档 855-2-558-21）。话是这样说了，但看历史拂过的这一页上，无论省会在保定时，在天津时，乃至来到石家庄市的相当长时间内，河北真的没有找到工业化建设的“北”。“提高两线”（京广、京山铁路沿线）、“狠抓两片”（黑龙港与坝上）、“建设两山”（太行山和燕山）等，一直是叫得最响的发展思路主题，及至改革开放，河北

仍在苦苦地为发展战略而寻找出路，到1985年才有了“山海坝”。多年来，河北被称为“东部区位、西部观念、中部水平”，不该认为这只是个讽刺，应该经常找找这“病根”。反观天津，不畏路途远与偏，在河北建设了包括省境最南端的涉县天津铁厂在内的若干大项目，至今为天津也为河北作着贡献。现在，从涉县通往天津那个专列的每天铿锵中，当给河北这样的启迪：忘掉那些不愉快吧，并要虚心向天津学习。

话题三：省会是有了，但靠搬迁，不会轻而易举地搬出“中心城市”。时下，人们对“中心城市”的呼声越来越高。看河北省会搬迁，从“城”的角度，当说两句话。一句是：“省城”与“中心城”，并不是一回事。凡省城，因是省政权所在地，均可冠以“政治中心”，而在全省是不是真正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当有别论。当年省会在保定，认为那里不是经济中心，也建不成经济中心；后来省会到了石家庄，相当长的时间内，也还不是什么经济、文化中心。看来，传统的“三心同具”，从一开始，可能就被“中心城”发展的实践所争议。另一句是：省会可以迁、可以变、可以选，甚至可以由行政手段决定，而中心城市，只能顺应发展趋势经艰苦建设而成。称石家庄“火车拉来的城市”，话很形象，因为“拉”，意味着经济的自然流动，比较合乎规律。但如讲，“火车拉来一个省会”，这话恐怕得打问号。原因也很简单，省会可以拉来，又是可以拉走的。反省河北省会选择的苦涩，其苦根，均在一个“建”字，而“迁”，只是表皮。第一次“建新”失败，实败于不知量力而行，因房子问题把摊子铺得过大了；第二次“找大”告负，实负于对自己地位、能力的不恰当估计，没办法把包括津市在内的全省建设搞上去。当年身在省会找省会，说者“省会领导”，“先天不足”，恐没有想过，哪里先天就足呢？要补足，惟有踏踏实实苦练建设这个“基本功”才是。几乎与河北“建新”的同时，河南省也经历着资金难题将省会自开封迁郑州，其结果，一次成功，人家的经验是什么？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河北确需多找几面镜子照照自己。石家庄当年小，做河北省会“正打不着，歪打正着”，经几十年建设，终有了今天这样子。然用现代化的眼光来审比其建设的水平与能力，大家心里有数，应更加努力。现在，河北省会有了，